

吴地廉洁文化探论

——以吴宽《廉石记》为中心

陶 莉

(苏州市职业大学 吴文化传承与创新研究中心, 江苏 苏州 215104)

摘 要: 底蕴深厚的吴文化具有崇文重教、重德向善、精致典雅、开拓创新的典型特性, 包含了以文“化”人、仁爱克己、爱国奉公、以德育人的廉洁人文精神。自泰伯、仲雍奔吴, 汉末陆绩带回“廉石”到唐宋至明清, 吴地涌现了一批深受民众爱戴的廉吏清官。以“廉石”为代表的廉洁文化是吴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关键词: 陆绩; 廉石; 《廉石记》; 廉洁文化; 吴文化

中图分类号: G112 : D691.49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8-7931 (2018) 05-0055-06

二千五百多年前, 孔子就主张“德治”“仁政”, 强调以仁为本, 以德为政; 以礼为准, 律己修身; 以义为绳, 唯德是用。孟子丰富之, 主张“爱民”“选贤”“取廉”。苏州人文历史积淀深厚, 自泰伯、仲雍南奔, 季札“三以天下让”, 引领吴地形成尊贤向善之风, 涌现出一大批清官廉吏, 并为朝野所公认, 为民众所爱戴, 如汉末陆绩, 北宋范仲淹、欧阳修, 明代况钟, 清代汤斌、林则徐、暴式昭等。以“廉石”为代表的廉洁文化是吴地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宽在《廉石记》中赞曰:“君子则赏之。岂徒赏之? 人又从而贵之敬之, 视其物殆与鲁璜、秦璧等, 非物也, 人也, 该当汉末吴郡陆公。”^①将陆绩喻为鲁璜、秦璧而“贵之敬之”, 这是对陆绩“廉石”以及吴地历代颂扬和追随廉洁思想的概括。

据《新唐书·陆龟蒙传》记载, 陆绩“为郁林太守, 罢归无装, 舟轻不可越海, 取石为重, 人称其廉, 号郁林石”^[1]。唐时, “廉石”为陆氏后人所保存, 后埋没于土中, 不为人知。直至明弘治丙辰(1496), “今监察御史胙城樊君祉巡按吴中, 闻而美之, 谓知府史侯简曰: ‘先哲遗物, 固宜表识, 且有可以风厉乎人者。顾其石僻在东城, 非官吏朝夕属目之所, 其为埋没等耳, 吾将有以置而立之。’ 侯以为然。于是吴县知县邝璠、长洲县丞王纶相, 与督役夫曳置察院之侧, 作亭覆之, 而樊君为名之曰‘廉石’”。“石之立为弘治丙辰四月, 越月而亭成, 樊君既题其楣曰‘汉郁林太守陆公廉石’, 复别琢石。”^②到清代, 亭子颓毁, 廉石埋没于瓦砾。康熙四十八年(1709), 陈鹏年担任苏州太守, 在苏州府学旧址上修葺郡学, 将廉石移至郡学中, 与况公祠相对。1988年, 苏州市人民政府将廉石迁至苏州孔庙——今文庙明伦堂前,

收稿日期: 2018-06-03

基金项目: 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项目(2015SJD569); 江苏省高校“青蓝工程”资助; 苏州市职业大学“青蓝工程”资助

作者简介: 陶莉(1979—), 女, 江苏靖江人,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区域文化。

引文格式: 陶莉. 吴地廉洁文化探论——以吴宽《廉石记》为中心[J].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8, 35(5): 55-60.

① 吴宽:《廉石记》, 见《匏翁家藏集》,《四部丛刊初编》第1567册。

② 同①。

列为苏州古迹，誉为“苏玉”。从此，陆续的廉石成为吴地廉洁文化的符号。

一、底蕴深厚的吴文化及其特质

吴文化是吴地的区域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泛指自泰伯立国勾吴以来，吴地人们创造出的与自然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及其物质、精神成果的总和。^[2]吴地地理环境优越，气候温润，区域文化底蕴深厚，且具有明显的地方性特色。苏州位于吴文化核心区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自泰伯、仲雍南奔至太湖流域立勾吴国始，历三千多年，发展成为今天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在苏州发展历史上，出现了众多贤者名士：“以天下让”开拓江南文明的泰伯、苏州城的建造者伍子胥、南方夫子言偃、“先忧后乐”的范仲淹、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爱国情怀的顾炎武等，不胜枚举。这些贤者名士身上凝聚了吴地文化崇文重教、尚智好学，精细雅致、精益求精，开放包容、多元共荣，开拓创新、敢于争先，温和谦让、乐善好施等特性。

（一）包容开放，博采众长

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和善于集长补短的变革创新精神，构成了吴文化的开放性特色^[3]。泰伯、仲雍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吴国建立后孙武、伍子胥等引入了齐楚文化，南朝齐梁时期的士人迁徙为吴文化的发展又注入了新的活力。至此，吴地民风实现了从“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4]的尚武骁悍到崇尚文化的转变。

（二）睿智灵秀，积极向善

苏州古城的地理位置占尽优势，濒临长江和太湖，至今保持着“水陆平行、河街相邻”的双棋盘格局。古城以水为中心，内外护城河、河道与街巷平行相邻又纵横交织，水在古城中贯穿萦回。“自来言吴地者，称其水胜”^[5]，水是苏州古城风貌的独特基调，是苏州文化发生之根、发展之流。水造就了苏州传统文化坚韧柔雅、包容并蓄、厚积薄发、敏锐灵活、刚柔相济、动静和谐的特点，并孕育了苏州地区温和谦让、救人危难、乐善好施的优秀传统，从泰伯的谦让奔吴、季札数次退让王位不受“弃其室而耕”^[6]到自奉俭约但对贫窶之人慷慨解囊的范仲淹，再到明清时期十分兴盛的慈善救助事业，都显示了这一特点。

（三）求真务实，经世致用

早在南宋，吴地的商品经济即开始起步，明清时达到繁盛。吴地人民有开创实业的传统。明清时期的苏州已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航运中心、金融中心和文化中心。吴地人民广泛种植经济作物如桑树、棉花、茶叶等，在农作物经济发达的基础上，吴地手工业制造业也较为发达，工商业日渐繁荣，如造园技艺、刺绣、雕刻、造船等手工业技艺精湛，享誉全国。正是吴地人民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和孜孜以求的工匠精神，才使明清时期的吴地手工业有了“苏作”之称。明清以后，吴地文人倡导宋明理学，在经商中表现为坚持诚信为本的伦理道德，多家延续至今的百年老字号如“采芝斋”“黄天源”“陆稿荐”“乾泰祥”“松鹤楼”“雷允上”等即为代表。

（四）勇于创新，不断超越

晚清以来，江苏省尤其是吴地出现了大批践行实业救国的企业家。甲午战争后，苏州状元陆润庠创办苏纶纱厂，南通张謇创办实业，无锡荣氏兄弟创办面粉厂和纺织厂，以“实业救国”为宗旨，以爱国爱乡、振兴中华为己任。这些企业家形成了苏商群体。苏商在经营活动中形成了精细作业、谨慎稳健的特点，又注重审时度势、开拓进取。强调以义取利，坚持义利合一，在遵守道德标准的前提下追求利益，又用取得的利益履行道德义务和社会责任。

苏商价值观的最高目标是：坚持实业报国、惠世济民，把经商实业与实现富民强国结合起来，通过经济行为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7]苏商多为有深厚文化涵养的儒商，江南地区的水乡文化特点影响了传统苏商谦和柔韧的经商心态和低调踏实、埋头实干的经商作风的形成。正如苏商王文显所说：“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8]吴地人踏实肯干、求真务实的特性延续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显示着强大的生命力。

二、吴地廉洁人文精神的主要体现

自泰伯、仲雍起，吴地涌现出的一大批清正廉洁的官吏是吴地廉洁人文精神的代表，吴地廉洁人文精神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崇文重教，以文“化”人

吴地的教育历史源远流长。春秋时期言偃远赴鲁国向孔子求学，开启东南向学之风。言偃的言传身教对南方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风气的转变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后人尊称他为“南方夫子”。秦定鼎中原后，统一了六国文字，使文化的交流和传播更为顺畅，也为吴地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东晋以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社会安定，经济逐渐发展，吸引了大量士大夫、文人墨客寓居，读书之风日渐兴盛，尊重知识、敬仰有学有德之士的社会风气逐渐形成。而在吴地为官的也多为德高望重的博学名士，“吴下全盛时，衣冠所聚，士风笃厚，尊事耆老。来为守者多前辈名人，亦能因其习俗以成美意。旧通衢皆立表揭为坊名，凡士大夫名德在人者，所居往往以名坊曲”，“此风惟吴邦见之”。^[9]隋唐时期，吴地的教育事业也获得空前发展，社会风气由原先的尚武转化为尚文重教，至迟到宋代，吴地文化的基本风貌和主要特征已经完全被崇尚文化所取代。北宋时期，吴地官学迅速发展，带动了吴地教育的勃兴。明清时期，吴地社会经济空前繁荣，文化教育事业繁盛，以苏州为中心的吴地形成了“唯有读书高”的精神追求和社会信仰。吴地涌现了大批以“耕读传家”的文化世族，绵延数百年而不衰。崇文重教，以文“化”人，不仅培养了众多优秀杰出的人才，更促进了苏州地区民众的教育程度和道德修养、市民素质的提升。

（二）仁爱克己，先忧后乐

仁者爱人，超越小我，实现大我。克制私欲，为公为民。在苏州地区，仁爱克己的社会风气自泰伯、仲雍南奔便已开始传承。泰伯、仲雍以周室天下为己任，不争不夺，以“至德”之心奔于吴地，建立勾吴国。东汉末年，陆绩正直清廉，为官多年深得百姓赞誉，卸任归乡时，因行装单薄无法行船，只能搬取石头压舱，船才得以顺利起航。后人传颂陆绩的清廉事迹，吴宽以鲁璜、秦璧喻陆绩，是苏州“廉石精神”的起源。北宋时期，范仲淹倾尽资产在家乡苏州购置千亩“义田”，扩建“义宅”，创办“义学”，为乡族贫寒者提供救助，史称“范氏义庄”，开创了中国的慈善事业。“范氏义庄”延续九百余年，对吴地后世的慈善事业起到了积极深远的带动作用。范仲淹“先忧后乐”的高尚情怀更是苏州人爱国爱民、一心奉献的精神食粮和源泉。

（三）爱国奉公，廉洁传统

吴人外柔内刚、仁爱有德的人文精神还体现在充满爱国情怀等方面。明代中后期，吴地的东林党人“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惩弊救世、天下为公为己任。明末清初，杰出的思想家、爱国者顾炎武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仁人志士的共同心声。晚清苏州名士冯桂芬为洋务运动奔走呼号，殚精竭虑；王韬积极宣传改良思想；南社诸君子投身于

辛亥革命,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为公的高尚情怀。

自唐宋起,吴地的地方官员大多重视弘扬和倡导儒家文化,如唐代常州刺史独孤及,宋代常州知州王安石、明代苏州知府况钟等,他们的品格操守、社会治理方策不仅对当时的官吏们起着表率 and 引领作用,更影响后世吏治之风。清乾隆时期,“以清节为天下第一”的陆燿坚守“为官不名一钱”的廉洁准则,“利莫大于阜民财,害莫深于夺民食”。^[10]

(四) 家学深厚,以德育人

自唐以降,吴地诸多名门贵族十分重视家庭教育,家学深厚,父子兄弟间互相勉励,形成家庭互学共进的氛围,如唐代归氏家族,清代吴县潘世恩家族、常熟翁氏家族等。这些世家大族引领了时代的向学之风,是吴地崇尚文化、尊师重教民风的典型代表。莫釐王氏家族“好学重礼”^[11]且勤俭忠厚,自南宋迁至苏州东山,至今已经有六百多年的历史,王鏊、王禹声、王永熙等入沧浪亭“五百名贤祠”。王鏊一生为官清正廉洁,后人尊称他为“天下穷阁老”。

在吴地大家族的家庭教育中,母亲担当着严师贤母的角色和重任,既教育子弟读书,亦注重子弟品德的修炼。顾炎武的妹妹顾氏,教子甚严,丈夫游学在外,她督促儿子徐乾学、徐秉义、徐元文刻苦攻读,“课诵恒之午夜不辍”^[12]。后来徐氏三兄弟以“同胞三鼎甲”名震全国,徐元文摘得状元桂冠,徐乾学、徐秉义都是一甲第三名探花。常熟翁氏家族是有着深厚文化品位的书香门第,人才辈出,以翁同龢最为知名,三子公卿,四世翰苑。

吴地世家大族通过世代藏书藏画,教育子弟读书藏书,弘扬家学,数代递承,增益聚多。如毛晋汲古阁历经数代,终成藏书大家;铁琴铜剑楼历经瞿绍基等五代,成为晚清四大藏书楼之一。苏州文徵明、彭年、王鏊、袁褰、顾德育,无锡尤袤,昆山叶盛,太仓王世贞等都是藏书世家,后世子孙多有杰出之士。晚清顾氏过云楼、怡园数代递藏书画精品,“为有清一代艺苑传人之殿”^[13],其后人多为传统文化传承和振兴奉献心血。

(五) 文艺繁盛,弘扬廉洁

吴地的廉洁之风还通过繁盛的吴地文学艺术等传播,很多吴地的民间故事、文学作品、戏曲作品等世代传承廉洁风气,如著名的昆剧代表作《十五贯》,就是以况钟为原型,反映了他体民苦、察民情,歌颂况钟刚正不阿、执法严明、清廉高洁的思想品格和深入实际的求实精神,至今广为传唱,深入人心。1956年,昆曲《十五贯》上演后,经毛泽东、周恩来推荐观看,况钟的清廉之名享誉全国,也救活了昆剧这一剧种。明冯梦龙《警世通言》有一篇《况太守断死孩儿》,赞扬“况青夭折狱如神”^[14]。况钟去世后,苏州一府七县百姓皆建况公祠,纪念这位“清风两袖朝天去,不带江南一寸棉”(况钟《拒礼诗》)的清官。

三、“廉石”精神的当代传承

苏州历代都有尊崇清官廉吏的传统之风,至今文庙仍保存着一块司马光手书的“思无邪公生明”石碑。2008年8月,苏州申报全国首个廉政文化注册商标“廉石”获得成功。在廉洁文化宣传方面,苏州市围绕陆续廉洁从政的历史故事,提炼“廉石”精神为:“廉俭、厚德、正义、民善”,并持续推进以“廉石”品牌为引领的廉政文化建设。

(一) 扩大“廉石”品牌文化影响

围绕“弘扬廉石精神,促进时代发展”主题,苏州市开展了“廉石文化系列活动”:筹建“廉石文化展示厅”、举办“廉石书画”笔会、召开全市廉洁文化经验交流会、编印《廉洁文化建设经验汇编》等。苏州各地积极联动,张家港和吴江的“廉洁文化宣传月”、常熟“510”

训廉日、太仓“勤廉课堂”、昆山“鹿城清风”廉洁文化周等活动，展现了廉洁文化建设的新成果，形成了崇尚廉洁的社会氛围。

（二）提炼“廉石”品牌文化精髓

苏州市纪委监委与苏州大学联合成立苏州廉政建设与行政效能研究所，专题研究“廉石精神与时代发展”，总结提炼了“正义、民善、廉俭、厚德”的“廉石”精神，丰富了具有苏州特色的廉洁文化建设的新内涵；与苏州市委党校联合成立廉政教育教研室，联合研究廉洁文化建设的具体问题；策划组织了“廉石精神与时代发展”征文，汇编成《廉石的力量》；在“廉石网”上开辟廉洁文化专题论坛，吸纳各方建言献策；开设“廉石”大讲堂，邀请中央纪委宣教室领导及著名专家学者，进行廉洁文化建设讲坛辅导。

（三）增强“廉石”品牌文化辐射

苏州市以廉石网为龙头，整合辖区九个特色网站，形成两级联动的反腐倡廉专业网站群，如张家港廉政网、常熟党风廉政网、太仓勤廉网、鹿城清风、鲈乡清风、吴中清风、阳澄清波、姑苏廉石等。积极创作各类艺术作品，宣扬廉洁文化。创作的锡剧《李荣法》刻画了一个为村民致富而献身的江南村支书形象；还创作了大型历史锡剧《九品廉吏》；出版著作《廉石千秋》和系列动画片《廉洁从政从我做起》。《苏州日报》推出“廉石”专版，苏州广电总台新闻频道特设《廉石》电视栏目。

苏州市还开设了国内首条廉洁文化旅游专线，集中展示了苏州府学文庙“廉石”、沧浪亭五百名贤祠、况公祠、桃园“百廉馆”、范仲淹纪念馆、顾炎武故居等廉洁文化教育基地和景点。旅游专线的开设既宣传了吴地重要的廉洁文化，更让观览者在体验传统文化精髓的同时，深刻体会历代廉吏廉洁奉公、爱民如子的高尚情怀，从而将廉石文化精神融入工作实践中去。

参考文献：

- [1]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613.
- [2] 徐静．吴文化概说[M]．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13：1.
- [3] 耿建钢．浅谈吴文化的源流及其影响[J]．常州工学院学报（社科版），2012，30（4）：1-5.
- [4] 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1667.
- [5] 曹允源，李根源．民国吴县志·舆地考[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1：240.
- [6] 刘勰．十三经注疏集·春秋左传精读[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4：1031.
- [7] 卢雄勇．苏商伦理及其社会价值研究[D]．南京：南京大学，2011：1.
- [8] 董楚平．吴越文化新探[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17.
- [9] 范成大．吴郡志[M]．陆振岳，点校．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3.
- [10] 吴江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吴江县志[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830.
- [11] 任继愈．中国藏书楼[M]．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968.
- [12] 朱端强，姜胜利．明清状元别传[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1：30.
- [13] 顾文彬．过云楼书画记·续记[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1.
- [14] 冯梦龙．警世通言[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3：425.

（责任编辑：时 新）

A Discussion of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Culture in Suzhou: Centering on *Lianshi Ji* by Wu Kuan

TAO Li

(School of Management,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e profound Wu Culture advocates the ideas of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scholars and education, and focusing on morality and benevolence. It is exquisite and elegant, and it also supports innovation and the pioneering spirit. Wu Culture embodies the humanity-based incorrupt government essence that “nurtures” the humanity, stresses fraternity, self-restraint, patriotism, and morality good to one’s growth. Since Tai Bo and Zhong Yong’s arrival in Suzhou, and the “Stone of Honesty” brought by Lu Ji during the late Han Dynasty, and throughout the dynasties of Tang, Song, Ming and Qing, Suzhou witnessed a good number of incorrupt government officials who are revered by the people. The incorrupt government culture with the “Stone of Honesty” as a typical example is a significant part of Wu Culture.

Key words: Lu Ji; Stone of Honesty; *Lianshi Ji*; incorrupt government culture; Wu Culture

(上接第 25 页)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Analysis and Comment on Tao Yuanming’s Approach to “Tao”

LIU Zhongwen

(Center of Academic Journals, Suzhou Vocational University, Suzhou 215104, China)

Abstract: The academic debate on the specific connotation of Tao Yuanming’s “Tao” has been sparked for more than 1300 years. Su Shi, Luo Dajing and Chen Yinque interpreted Tao Yuanming’s “Tao”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world view, values and philosophy of Taoism. Huang Che and Zhen Dexiu demonstrated that Tao’s “Tao” is the one originated from the spirit of Yao and Shun as well the teachings of Confucian classics. Ge Lifang’s astonishing view of “the first Dharma” didn’t draw much attention. Xie Ke, Pan Dexing, Liang Qichao and Zhu Guangqian clarified that Tao’s “Tao” is a mixture of Confucianism, Taoism and Buddhism. The writer agrees with the study methods taken by Master Zibai, an eminent monk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Zhong Xiu in the Qing Dynasty, both of whom interpreted Tao’s “Tao” from “the state of mind” and the elimination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philosophical and religious schools. Seen from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Tao Yuanming is a greater metaphysician. His contribution is to put Guo Xiang’s theory of “the cohes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into practice throughout his life. In other words, he proved the feasibility of Guo’s theory. For Tao Yuanming, the cohes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means the unity of human and nature. Besides, both the era in which Tao lived and his social connections have contributed the inevitable effects that Buddhism exerted on him.

Key words: Tao Yuanming; Tao; Taoism; new thoughts of nature; spirit of Yao and Shun; the first Dharma; mixture of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state of mind; metaphysician; cohes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analysis; comment